

一个第二代华人的自述(续)

(美) 麦礼谦

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之交，美国黑人的入权运动蓬勃发展，新兴的华裔中产阶级也受影响，更加积极争取在美国社会的平等地位，弘扬华人对美国社会的贡献也属于这运动的一个环节。1963年，一些华裔成立华人侨美历史学会（1982年改名美国华人历史学会），研究美国华人历史及搜集收藏有关文物文献。我在1965年参加这个学会。不久，我发觉我多年来积累对中文及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知识对美国华人史研究一些领域能够发挥肯定作用，很快我就成为历史学会中坚份子之一。1971年，1976年，1977年被选为学会会长，并历任董事。

1967年，华裔刘池光在旧金山创办中英文旬刊（不久改为周刊）《东西报》，反映华裔中产阶级所关心的各种社会问题。这年底，该报馆聘请黄运基为编辑。黄君是我在民青时代的老友。他与我联系，要求我义务帮忙校对工作及撰写有关美国华人历史稿件。我答应了，就这样与《东西报》建立了关系。这也是我用英文撰述美国华人史的开始。我撰写的文章主要叙述19世纪华人对美西经济建设的贡献。当时这在报刊还是罕见，所以迎合华裔中产阶级的客观要求，颇受欢迎。我要在《东西报》投稿，也鞭策我更积极地找寻美国华人史料。以后的六七年间，我在假日、周末成为旧金山湾区各图书馆的常客。我到其它地区度假，也趁机搜集有关当地华人的资料。在这期间，玉英经常开车送我到这些地方，又帮助复印资料。在她的支持下，加上静电印刷复印机提供的方便，我很快就积累一个较丰富的资料库，方便了我写作及研究活动。

黄运基在1969年离开《东西报》，另创办《华声报》。几年后我也因为社会活动太忙而停止在《东西报》担任校对工作，并减少投稿，但我仍继续与刘池光及《东西报》保持联系。在80年代退休后，我又重新参加《东西报》的出版工作。

1968年左右，我开始得到美国华人历史学权威区宠赐（南海区村人）的指点。区君多年前与父亲在缝纫衣厂已经是相识。他曾在南侨学校教书，是我二弟的老师，不过与我却素少来往。区君熟悉中英文史籍，自50年代已经开始研究加州华人史，颇有心得，但他不善社会交际，所以社会也不注意到他的学术成就。不过由于我与他有共同的研究范围，因此由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经常与他交换资料讯息。我要着重指出的是他对我研究方法的启发，尤其是对于重视中文资料方面。他对我的稿件也提供过积极性的意见。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对华人史的研究工作进步得更快更顺利。我在70年代参加了他主持的三邑会馆史编撰工作。不过我只负责小部分，这就是《美国三邑人口之分布与变迁》及《美国三邑侨行业之变迁》两章，我又将这书的“目录”及“会馆简史”译为英文。《旅美三邑总会馆简史》在1974年出版，内容大部份是区君多年精心考据的成果，是美国华人

社团史罕见的学术性著作。可惜的是在1976年我与他发生了误会而断绝来往。区君在1982年心脏病发作而去世，是美国华人历史学界的损失。

60年代末，在民权运动推动下，少数族裔不断要求学校教材包括更多有关少数族裔对美国社会贡献的史实。但美国学术界却长期没有重视少数族裔史的研究，所以这种资料并不容易得到。为了协助教育界填补有关美国华人史的一部份，华人侨美历史学会在1969年4月召开“加州华人历史讲习会”，除了组织演讲及讨论项目，历史学会又刊印一些参考资料，由陈参盛，胡垣坤与我负责编撰工作。当初陈参盛以为只需要编写短文及选录文件。但这时候我已经在《东西报》发表了几篇文章，而且又搜集了一批资料准备继续写稿。我既然在手头上已经有资料，当然是有利于历史学会的刊物能够包括更丰富的内容，所以在短短三、四个月，我们这三个人就完成了一本较完整的《加州华人史大纲》。我负责的部份主要是有关中国近代史，侨乡地理，及华人发展加州经济的史实各章，约占全书的七成多。这书后来成为一本有关美国华人历史的基本参考资料。这却是编者当时所未预料到的。

同年旧金山州立大学少数族裔罢课，要求校方设族裔研究学系。结果在这年秋成立美国最早一间族裔研究学院，亚裔研究是其中一个学系。接着柏克莱加州大学也闹学潮，要求设亚裔研究课程。

1969年夏，旧金山州立大学历史系与我联系，说要设美国华人史课程，拟聘我为讲师。我当时还在贝克特尔公司任工程师职，时间比较紧张，所以就推荐胡垣坤与我分担讲授这课程。这年秋季，我们两人开始讲授美国大学最先设立的美籍华人史课程。跟着，这课程转交给亚裔研究系负责。后来我在1972年至1975年在旧金山州立大学讲授这课程；在1978年至1979年及1984年又在柏克莱加州大学负责同一科。在1971年胡君与我根据讲学汲取的经验，编撰了《美国华人史提纲》辅导学生。

1970年，美东学者倪维克多（Victor Nee）夫妇接受出版公司的委托，来旧金山作社会调查，准备写一本有关现代华人社会的著作。作者计划在这书中包括大量个人的口述历史，但他们人地生疏，所以要求我及其它华人社会活动份子介绍情况及联系各界人士。这书在1972年以《加州的漫长岁月：一个美国唐人街纪实的研究》为名出版，是近年第一本较客观地反映华人社区实况的著作。为了答谢帮忙他们的人们，作者就在书里题辞，将书贡献给他的父母，另一个就是我，这后者确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因为我对他们不过是尽力帮忙他们顺利完成这项目，希望出版的书可以反映华人社会的客观情况罢了，从来没有联想到会给他们这么深刻的印象。

1970年，玉英已取得留美权，所以就与我到香港一行。这是她离香港到美国21年后第一次到这里。在香港大会堂，我与檀香山的谢廷玉会面，谈及檀香山成立历史学会的计划。在归美途中，我们就在火奴鲁鲁逗留几天，与当地几名对檀香山华人史有兴趣的社会人士及学者开座谈会讨论有关成立历史学会的问题。我在座谈会上提出意见应该重视研究及出版工作。我回旧金山后的翌年，夏威夷华人历史中心成立。历史中心成立后，历年出版的书刊都比美国大陆的华人历史学会多，对推动当地华人历史研究起了肯定的作用。

1972年，《关心亚洲学者通报》拟在秋季出版美国亚裔专刊。倪君是编辑之一，曾

与我联系。据我回忆，他是要求我撰稿叙述民青的历史。我当时已经着重搜集华人左派的资料，所以就决定扩大文章涉及的题材范围，撰一篇《美国华人左派组织历史概论》，叙述这些组织多年为改善社会的奋斗史迹。这篇论文后经修改，在1976年收入洛杉矶加州大学亚裔研究中心出版的课本《对音：对美国亚裔社会的各种观点》（Counterpoint, Perspectives On Asian America）。文章初次发表后，我收到早期美国共产党党员张根棠的来信，纠正及补充我的一些论点。经过几次的通信，他帮助我进一步加深对左派运动历史的了解。

在60年代末，旧金山华裔争取均等机会的活动日趋积极。到了70年代我也有机会参与其中一部份活动。先是，华裔在1969年成立华人就业协进会（1981年改名华人权益促进会），争取美国华人就业上的均等机会。这组织属下设有华人广播协会，协助华裔在传播界里找寻职位，并要求传播界制作华人社会所需求的节目及消除传播界节目里对华人的公式化偏颇形象。在70年代初，华人广播协会与旧金山的LQED—FM电台交涉成功，电台愿意每周免费提供一小时给华人社区播放节目。1971年初，华人广播协会组织《汉声》，开始播送粤语节目。开始，我在民青一些朋友的帮助下，每个月为《汉声》制作半小时的音乐节目。但到这年秋，这节目的协调人曾翠玲卸职，找不到人，所以我就迫不得已要接上负起全盘责任，每周都要制作节目播放。《汉声》的节目通常以粤语报导或讨论有关华人的社会活动及时事，又用粤语英语介绍中国民间及古典音乐。在70年代后期《汉声》经常在我的家录音，所以玉英也成为听众熟识的播音员。这节目初时是每周播放一次，但后来另一个电台提供时间，所以每周又重播节目一次。

在70年代初，旧金山还未设有华语电视节目，所以《汉声》拥有一些听众，能够帮助不懂英语的华人较容易适应美国社会，同时《汉声》是当时旧金山唯一经常介绍中国现代作品及演奏家的华人节目。我负责这节目的13年半。到1985年，我要当粤剧团的陪同到美加各城市作巡回演出，才辞去《汉声》协调人职务。

1972年，旧金山第4频道电视台在华人广播协会敦促下，同意制作美国华人历史纪录片《金山客》，共有6集。在定稿及拍摄期间，胡垣坤与我是这片的咨询人员，胡君也是片集的讲解人。《金山客》在1974年首次播放。直到80年代中，这还是有关美国华人史最详细的一套电视记录片集。

当《金客山》纪录电视片还在制作过程中，在旧金山湾天使岛已经丢空了多年的移民局拘留所墙上被发现有早期华人移民所刻的诗。当时管理部门已经计划将这危楼夷平，但一些热心的亚裔人士探知这消息，就组织起来运动加州众议院保存这历史遗迹。结果，在1974年加州众议院通过议案，成立天使岛移民拘留站历史咨询委员会。我也被邀请成为委员之一。委员会在1976年发表报告书。跟着，加州众议院通过决议修葺并保存这楼房，将它开放为移民历史展览馆。到1978年餐馆巨子维克多·伯奇龙又捐建纪念碑，在1979年揭幕，碑上刻了委员会征集评定的对联：

别井离乡，漂流羈木屋；

开天辟地，创业在金门。

这正好表达华人移民在美国社会创业的艰苦奋斗精神。1976左右，我又与杨碧芳及林小琴合作编写天使岛移民拘留站的历史并将壁诗译为英文，保存了一些20世纪早期的美国

华人文学作品。这《埃仑诗集》在1980年出版。

我受区宠赐所影响，颇重视搜集及保存中文资料，区君在50年代初曾撰硕士论文《加州华人出版及未出版的作品刊物及其作者的小传》。我继续他的工作将华人报纸目录部份扩充到包括全美国及加拿大。1973年我得知华盛顿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卢国邦也正在搜集同样资料，因此我们就同意合作编一本《美加图书馆收藏北美洲中文报联合目录》，在1977年出版，首次将美加各图书馆收藏的美洲报刊目录发表。书里收入我撰的一篇《美加报业简史》。经过我修改补充后，这篇文章以《美国华人报业》为题目被收入1987年出版的《美国族裔报业》一书。

另外一本工具书《关于美国华人中文资料提要》可以说是《中文报纸联合目录》的姊妹篇。先是，华人历史学会1975年在旧金山召开第一次美国华人历史研讨会的期间，宪政党喉舌报《世界日报》的楼业行将出卖。业主的代理人知道这报馆在美国华人社会有悠久的历史，应该会有些有历史参考价值的文件，所以就到研讨会通知我，允许我在出售楼业未完成交易之前进入报馆看看有没有应该保存的历史资料。结果我与胡垣坤用了几个周末的时间，由这已经关了门多年的报馆取去大批书籍、报纸、档案文件及书信，这是美国华人史料一个丰富的收获。到1978年柏克莱加州大学亚裔研究图书馆成立美国华人研究资料中心，我就将这批资料寄存在那里，让学者们借阅。同年，洛杉矶加州大学亚裔研究中心又委托我根据这批资料并找寻旧金山湾区各大学及历史学会所收藏有关美国华人的资料，编撰上述的《提要》，在1986年出版。

我虽然爱好中国文化，很早已经向往到中国观光，但在一个长期间却不能遂我的心愿。1962年我陪卧病的岳母到澳门与岳父团聚，才首次到香港、澳门一行。但当时美中关系仍然恶劣，所以中国的大门对我还是关着的。到70年代，美中关系渐趋和缓，两国的交往也开始增加。在1976年，我组织美华历史学会团获批准入中国大陆。这团的成员有《汉声》的王灵智、胡景南及杨丽珊等，历史学会的胡垣坤夫妇，与民青的陈秀仲及我两夫妇等15人。当时恰好贝克特公司派我到法国巴黎出差，任务完成后，我就经英国伦敦、新加坡到香港与这团汇合，我也趁这机会了解一下这些地方的华人状况。

1976年是中国多事的一年。这年头周恩来总理逝世，我们的团到天津的早上，就听到电台宣布朱德元帅身故；我们离开广州到香港，又得知唐山大地震的消息；我们回到旧金山不久，毛泽东主席就去世，“四人帮”随着被打垮。当我们在国内参观期间，“四人帮”横行中国内部斗争趋向白热化，但我要到打倒“四人帮”之后才较清楚知道这些情况。不过这次到中国却有一个肯定的收获。我在佛山有机会与失了联络20多年的叔父母会面，也初次与堂弟礼明、礼星及家人相见。回美国后，我就向正在疗养院长住的父亲报告。听了这安慰的消息后，他就在这年冬与世长辞了。

1976年首次到中国之后，本来打算再过三五年才来探亲或观光。但不久中国打倒“四人帮”采取开放政策，所以出乎意料之外，到1988年止，竟到过中国10次。其中多次是为了文化学术交流的项目。

1978年我们得到朋友送来一张广州春季交易会的邀请书。当年我们取道马尼拉、新加坡及吉隆坡，到这几个不同的华人社区观光，开开眼界，后来我们经香港入广州。这时候中国还未宣布开放政策，所以主要是探亲及观光，没有交流项目可言。

1979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亚裔研究中心与广州的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在台山侨乡进行社会调查。这是中国开放后美国与中国高等学校首次合作进行的研究项目，当时亚裔研究中心的成露西主任也邀请我参加这活动，可是我当时还在贝克特尔公司任职，所以只能够在中山大学及台山逗留的两周搜集资料。后来，我也藉这机会到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侨乡一行，增加我对这地理环境的感性认识。

旧金山的中华文化基金会是比较活跃的一个文化学术团体。基金会的宗旨是发扬中国文化及鼓励华裔文化的发展。它在旧金山华埠设中华文化中心为活动场所，经常举办讲习班、演讲会、音乐歌咏、戏剧表演及各类展览。我在70年代初参加为会员，1975年被选入董事会。

1979年，中华文化中心正在筹备有关美国华人历史及社会的大型图片展《甘苦沧桑两百年》。当时已经雇聘陈依范等搜集了许多图片资料，但具体的展览计划面对很多难题还未落实。刚好文化中心的主任孙小玲别有高就，提出辞职。群龙无首，展览能否按期完成顿成问题。当我在1978—1979年任华人侨美历史学会会长期间，曾先后积极参与这会主办的流动展览《旅程：过去的和未来的》(Journeys Made and yet to Come)，及历史学会博物馆的固定展览《对金山的期望》(The Promise of Gold Mountain)的具体设计工作，所以对于组织美国华人历史展览已经有较成熟的概念。为了保证顺利及时完成展出这项目，基金会的董事会就推选我主持这件工作，同时也主持在展览开幕后举行的第二次美国华人历史研讨会。经过陈依范等职员的紧张努力，这展览及研讨会在1980年秋按照原定计划依时开幕。这两个项目都很成功，对普及华人历史促进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起了肯定作用，获得好评。在这工作过程，我也有机会加深一步总结对美国华人史的见解。这年也是我著作出版最多的一年：计有《甘苦沧桑两百年说明书》(与黄显，黄赞光合作)，《埃仑诗集》，及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工具书《美国华裔集团百科全书》里介绍华人历史及社会的一篇文章。

这年旧金山《时代报》的总编辑黄运基邀请我撰写美国华人史。我本来拟将《百科全书》那篇文章翻译中文发表。但出了一两期就觉得不够详实，稍嫌“有骨无肉”，所以就改变初衷，决定根据授课的讲义与多年来搜集的资料编成华人史，每周在《时代报》发表。不久我发现手头上的资料并不够充足，但这时候已经欲罢不能，所以也只得硬着头皮，一边紧张地找参考书及看旧报纸搜集资料，一边编稿。结果，《美国华侨简史》由1980年4月2日开始，共连载了225期到1984年11月13日才结束，约有25万字。这作品已经不属于“简史”范畴了。在编撰这稿的过程，也使我对美国华人的历史渐形成有更全面的看法。

1982年，正当华南木棉花开的季节，我们有机会再到中国一行。这时候广东省华侨历史学会刚成立不久，我们在广州首次有机会与他们相识座谈。后来又到厦门、泉州、福州、上海作学术交流。这年中华文化中心的蔡流轮会长出任当地医师协会首名华人会长，分身不暇，所以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就推选我为会长，我也勉为其难接受了这职务。这年中华文化基金会与温哥华的中华文化中心合作，邀请广东剧团到美加演出，由名伶红线女为艺术指导兼主要演员。这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来美洲演出的第一个粤剧团，轰动一时，观众踊跃购票，为文化基金会筹了空前的8万多美元补助经费。

这年底会长任期满了，我经过一年的经验，知道自己不大喜欢交际，也不善于筹募经费，而且性格倾向学术研究，所以工作能力与会长职务不大相称，这年我又发觉患了糖尿病，不想精神上有太多压力，所以就坚持不继任会长，后来被推选责任较轻的董事会主席职。

1984年，我作一个重要的抉择。这年头《美国华侨简史》在《时代报》分期登载已经接近结束。恰好我计划到广州渡春节。未出发前，旧金山东风书店的黄达经理向我提议将《华侨史》稿一份交给香港三联书店，问他们有没有兴趣出版。当时我没有很大信心会得到肯定的答复。但出乎意料之外，三联书店萧滋经理却与我签了合约出书。因为我还要完成全稿，只需要将全稿修改并加上注解及补充资料，所以经过考虑，回来美国就向贝克特尔公司请假6个月，跟着就索性在年底提前退休，集中精神改稿并从事美国华人历史研究工作。不过我当时过低估计改稿所需要的时间及努力，以及其它社会活动对这工作的影响，因此要到1988年才完成修改稿件的工作。

在1985年，中华文化基金会鉴于1982年粤剧团的成功演出，又与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合作，邀请广州粤剧团来美加演出，我既然“退了休”，因此就被选为主持筹备工作及陪这团到美加四个城市演出。这团的演出水平在很多方面超过1982年来美加的粤剧团，但演员如倪惠英、卢秋萍虽然在广东艺坛有点名气，在美洲的知名程度却远不及红莲女，因此各地票房的成绩远不及1982年，没有达到筹款的目标。

1985年初，中华文化基金会又将《甘苦沧桑两百年》全套图片送给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这展览在中国第一次展出是作为旧金山——上海友谊城市文化交流项目之一。我结束粤剧团的任务之后就与玉英飞到上海。在这里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将展览的说明译为中文，并加上补充资料。这年底，我又到广州参加中山大学主办的《华侨、华人历史研讨会》，在会上报告《美国华人研究的发展及现状》。

1986年，我开始在柏克莱加州大学亚裔研究图书馆负责学术咨询工作并帮助整理有关华人研究的文件及档案资料。我也参加《东西报》的编辑委员会及义务负责副编辑工作。这年秋，中华全国侨联在北京展出《甘苦沧桑两百年》，作为全国侨联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之一，玉英与我被邀请参加开幕典礼。随后，首次在北京参加国庆。侨联又安排我们到山东、陕西、云南、四川、湖北、广东、上海观光并与各地侨联侨史界人士交流。此行增加了我对侨史的了解，拓宽了我的视野。

1987年，美国华人历史学会出版论文集《美国华人社会：历史与观点》(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我很久已经认为历史学会除了普及美国华人历史之外，还应该采取步骤促进美国华人史的研究，所以我在1985年提议出版一份学术性的刊物。这意见被董事会接纳后，在1987年出了第一期。这期收入我的一篇《中华会馆——会馆系统发展史》。区宠赐早已经向我指出学者普遍引用的资料，谢开撰的《中华会馆史》，有很多讹误的地方。我多年来也因此经常留意搜集有关会馆的中英文史料，所以这篇论文可以说是代表区君与我研究会馆发展史的结论。

1988年初，我又为《甘苦沧桑两百年》展览事再到远东。这年2月在香港举办《旧金山周》，这展览也被安排为一个活动项目。玉英与我被邀请到香港帮助布置展览的工作。任务完毕，我们就在香港及中国渡春节。